

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的合理性分析*

■肖楠楠

摘 要 在教育实践中,生态德育的效果并不明显,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观念的影响。提升生态德育的效果,需要进行价值观的转换,即超越人类中心论,走向非人类中心论。从外在和内在条件对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表明,外在条件包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哲学基础和工具理性的批判,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趋向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天人合一、我与你的哲学思想为其注入了思想之源;内在条件包括道德关系和个体德性,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构成从关系之维说明了从道德层面促进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可行性,道德境界论从个体德性之维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落实的可行性。

关键词 生态德育 非人类中心论 价值观 道德关系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8)04-0044-04

与工具理性的理念相呼应,现代学校教育所传递的世界观是物质主义的,人在自然之外,人拥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来控制自然的道德权利^[1]。从价值观层面来看,人类中心论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价值根源,生态德育在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主导下,让人对自然形成了错误的看法,“人们相信拥有的知识越多,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人们便开始不断地榨取自然,无度地向自然索取,致使自然不断恶化。由此可见,这种世界观是有损于自然的,或者说,学校教育本身在进行物化人性的再生产。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从生态德育的价值观转向上入手,即超越人类中心论,走向非人类中心论。本文将从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两方面对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一、外在条件 现实之基与思想之源

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合理性的外在条件包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哲学基础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三个方面,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趋向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则为非人类中心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天人合一、我与你的哲学思想为非人类中心论注入了思想之源。

(一)现实之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依据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了前工业社会(远古时代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态社会^[2],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相对应的主导理念。

1.前工业社会:人类中心论的萌芽期

在远古时代,人与自然是混沌统一的状态,人与自然是同质的,人类是自然界的顺从者、敬畏者和信奉者,此时,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状态。在农业社会,人类已经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并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观念。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能力虽有所增强,但受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类只是局部性地对自然进行利用与开发,此时,人与自然之间还是处于和睦的状态,但战胜自然的欲望在人的思想中已经出现,如中国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的口号,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都蕴涵着自然是受人随意支配的理念,可以说,人类中心论在农业社会已初露端倪。

2.工业社会:人类中心论的成熟期

工业文明时期,征服自然的理念占主导,人类中心

*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非人类中心视域下的生态德育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SJD8801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肖楠楠(1988-),女,山东临沂人,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德育研究。

论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迅速恶化,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存危机。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生态危机,这些事实使得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农业社会萌发的征服自然的欲望是人类中心论的驱动器,工业社会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为人类中心论的迅速发展与全面展开提供了现实之基。

对于什么是人类中心论,在生态伦理学中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但其共同点在于:人是中心,人与自然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3]。在人类中心论思想中,人是至高无上的,是凌驾于一切自然之上的,并且有权通过操控和掌握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甚至肆无忌惮地对待自然。进入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人对自然榨取与抢夺导致的后果已对人与自然的生存产生了重大威胁。人类中心论的局限性到了20世纪末已经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问题就集中于它所鼓励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行动导致了生态危机。

3.生态社会:非人类中心论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哲学,恩格斯曾经指出,“时代变了,哲学体系自然也会随其变化”^[4],虽然这是恩格斯于19世纪的言论,但在当前社会仍然适用。人类中心论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是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相匹配的。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哲学应符合的标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赋予自然权利,在此基础上建立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并对自然形成关爱、尊敬、敬畏的伦理态度。非人类中心论不仅承认人的内在价值,也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赋予了自然权利,人与自然各自具备独立性和目的性,因此,生态社会的哲学基础应是非人类中心论,它在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再度和谐。

(二)现实呼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工具理性并非从一开始就对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它是为解放人而产生的,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了极端化。工具理性的极端化使人在面对自然时,关心的是自然的实用目的,自然的价值视其有用性而定,只看重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忽略了其内在价值。人只关心怎么做而不关心是否应该这样做,这就导致了人在面对自然时,并没有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而只是把自然当成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引发了生态危机。

我们需要寻求与工具理性相制衡的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互补的,它可以和工具理性相互制衡。在价值理性主导下,人看重的是所选行为本身的内在

价值而不是所选行为的外在价值。当前,我们要重新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妥善解决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就要树立全新的自然价值观,在实践层面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看重的是其自身的价值,正好可以弥补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价值意义,从而促进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建立。

(三)思想之源:“天人合一”、“我与你”

1.文化土壤:“天人合一”

季羨林先生曾提出:“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的合一,其哲学内涵是^[5]: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之源,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价值本原;认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尊重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尊重自然万物生命的多样性存在和拥有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师法大自然“生而不有”的崇高德性。由此可见,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追寻自然的生命意义是“天人合一”理念最深刻的内涵之一。“天人合一”理念的现代意义在于用生命整体性原则引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建立,与非人类中心论所提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非人类中心论成长提供了文化土壤。有了本土哲学作为“营养液”来滋养非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就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就能够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内心坚定的信念,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使人类更好地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再次和谐。

2.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我与你”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开篇提到:人对世界持有双重态度,人与世界构成双重关系:“我一你”“我一它”^[6]。马丁·布伯认为,“我一你”的关系是关系的存在论本质^[7],我们很容易误认为布伯所说的“我一你”关系只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不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然而,布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我一你”关系是本真性的,也是我们最终所追寻的,可以通过“我一你”关系来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稳定的关系。在“我一你”关系中,人与自然是彼此独立、平等的关系,自然不仅是人认识的对象,其自身也具有目的性,这与非人类中心论所强调的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权利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我一你”关系定位中,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关怀式的关系,其等同于非人类中心论所倡导的道德关系。非人类中心论承认人与自然都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要求人不仅对人而且对自然也具有道德义务,旨在使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道德关系。

二、内在条件:个体之维与关系之维

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合理性的内在

条件包括道德关系和个体德性,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构成从关系之维说明非人类中心论可以从道德层面使人类走出生态危机,道德境界论从个体德性之维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落实的可行性。

(一)个体德性之维 道德境界论

道德是需要人在实践中落实的,道德境界论从个体德性之维为人落实生态道德提供了可行性。道德境界被认为是人如何领会人生的意义以及据此所展现出的心理态度与行为倾向性,根据人的德性修养水平不同,可以将道德境界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中,根据人所关心的存在物的范围大小不同,可以将人的生态道德分为“人类中心境界、动物权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生态整体境界”^[8]四种境界层次,这四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排列。在西方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动物权利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因此,生物平等境界、动物权利境界与生态整体境界可被视为非人类中心视域下的生态道德。从理论层面来看,以上四种理论虽具有不同之处,但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看,它们之间却是可以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它们可为环境保护的行为提供各有特点的道德原由和平分秋色的伦理佐证^[9]。在环境保护运动中,这四个层次是逐级递增的,也就是说,在保护环境过程中,道德水平的发展应是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以上四种道德境界中,每后一种都是对前一种的包容和超越,换句话说,每后一种都比前一种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四种道德境界展现了不同境界水平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道德水平,我们可以将动物权利境界层面、生物平等境界层面与生态整体境界层面的原则看作是保护环境的高级道德。作为一种生存伦理,人类中心可视为生态道德的“基线伦理”,作为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非人类中心论可视为生态道德的“高级伦理”^[10]。超越人类中心的人对自然产生道德反应,完全是超越了、摆脱了对人的意义,道德成了自觉、自为的行为,也即道德成为了他的本性。道德境界说从德性的角度为从人类中心论走向非人类中心论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撑。

(二)关系之维 道德关系论

通过道德关系的成立条件来衡量非人类中心视域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人与自然之间是否能构成道德关系。

1.道德关系:目的性、独立性

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称得上是道德关系。康德认为,人作为感性血肉的动物,

只具有相对价值,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则具有绝对价值,人因为被赋予理性而神圣,理性不能仅作为手段,理性本身就是目的^[11]。可见,人与人之间只有具备目的性、独立性这两个条件,才能称得上是道德关系。有独立性而无目的性,或有目的性无独立性,都不能被称为道德关系。

2.非自我中心的人际关系是道德关系

人际关系中存在着自我中心的人际关系和非自我中心的人际关系两种。“自我中心论”认为人的价值就是人自身,“自我”是最具价值的,把他人当作手段,“自我”当作目的,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就要无原则地满足“自我”的所有欲求。“自我中心论”否认“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把他者当作手段。因此,在自我中心视角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不是道德关系。在非自我中心视角下,人与人之间都要换位思考,不能只顾及自身,要走出自我,站在对方角度上思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他人的价值是独立于自我的,他人因其自身而具有价值,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所以,在非自我中心视角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道德关系。

3.非人类中心视角下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是道德关系

人际伦理与生态伦理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人际伦理和生态伦理探究的都是道德关系,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探究对象不同,人际伦理探究的对象是人,生态伦理探究的对象是人与自然,因此,我们可以将上述论证的道德关系成立条件运用到生态伦理中来。在人际伦理关系中,非自我中心的人际关系是道德关系。由此可以推出,在非人类中心视角下,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也是道德关系。非人类中心论不仅认可人的内在价值,也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是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人与自然各自具有独立性、目的性。生态道德突破了传统的人际道德,把道德关系由人与人的关系突破到人与物、人与事的全面关系,具体见表1。

表1 非人类中心视角下的道德关系

人与人	自己与他人(人己)
	个人与群体(群己)
	个人与自己
人与物	人与动、植物(把动植物看作独立价值)
	人与自然环境(没有生命的水土大气等有独立价值)
人与事	人与职业

4.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特殊性

一般情况下,在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中,彼此之间既

可以是道德代理人,也可以是道德顾客,但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中却不是如此。道德代理人是指能够做出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行为来,并对其行为后果负责的存在物。显然,只有人是道德代理人,而且还要是心智健全、具有一定理性能力的人。非人存在物是道德顾客,道德代理人从道德的角度((不同于经济或自利的角度)对拥有道德地位的道德顾客给予关心和爱护^[12]。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中,人是道德代理人,自然是道德顾客,因此,作为道德代理人,人有责任和义务为自然提供道德上的关怀与爱护,人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

“非人类中心论”的价值取向是自然的生命观,它并不否定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不排斥以物为手段,这种理论所倡导的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它需要在一个合理框架之下才能达成。生态德育在现实中要搭建怎样的框架才是合理的,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J.A. 帕默尔. 21 世纪的环境教育——理论、实践、进展与前景[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 125.
- [2] 张一兵.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前逻辑线索[J]. 社会科学, 1994 (2): 60-66.
- [3] 张世英. 新哲学讲演录(第2版)[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60.
- [4] 余谋昌. 确立生态伦理观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N]. 中国环境报, 2010-03-18(002).
- [5] 李振纲. 解读“天人合一”哲学的四重内涵[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 49-54.
- [6] [德] 马丁·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7.
- [7] 王晓东, 刘松. 人类生存关系的诗意反思——论马丁·布伯的“我—你”哲学对近代主体哲学的批判[J]. 求是学刊, 2002, (4): 38-42.
- [8] 徐嵩龄. 环境伦理学进展: 评论与阐释[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61-62.
- [9] 杨通进. 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J]. 道德与文明, 2000 (1): 6-10.
- [10]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213.
- [11] 金守东. 试论康德“人是目的”命题的理论内涵[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6): 101-103.
- [12] 杨通进. 环境伦理: 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26-29.

作者单位: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 徐州 邮编 221004

Analysis of the Rationality of Non-anthropocentrism as the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Values

XIAO Nan-nan

(Xuzhou Kindergarten Teacher College)

Abstract: In education practice,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is not obviously, its basic reason lying in the deep-rooted concept of anthropocentrism.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need to convert the values, which transcend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non-anthropocentr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ationality of non-anthropocentrism from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inner conditions. External condition includes the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the criticism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stagesocia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roviding a realistic foundation, Philosophy-Heaven and Man, I and you providing the source of thought; The inner condition includes the m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individual virtue. The m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lains the feasibility of promoting the human crisis from the moral level. The moral level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explain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relations from the individual virtue.

Key words: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non-anthropocentrism; values; moral relationship